

蒙元初期的丝绸之路与国家治理

闫国疆^{1,2}

(1.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2.新疆财经大学马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兴起和边界的快速推移,新疆由传统的中国边疆西域变为帝国版图的核心区。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一统天下,重构了此前衰微的丝绸之路。移藩去篱、交叠有效的治理,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生动诠释了“丝路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带一路”建设会使新疆由中国“边疆”跃居亚太“核心”,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路精神;移藩去篱;国家治理;身份认同;蒙元

中图分类号:F129.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2-0081-07

随着“一带一路”的热启,“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这种地位的跃升,不仅使新疆首次有了地图描画之外的“亚(欧中)心”感^[1],而且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机遇不等于结果,愿景也不等于现实。“边疆”变“核心”的空间推移,除了经济,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一带一路”的构建真能让新疆从千年“边疆”跃升为“亚心”,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历史的车轮不会按照设计的轨道前行。然而,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回顾历史,早在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开疆拓土,就使新疆在帝国边界的迅速推移之中,从传统中国的“边疆”跃居帝国版图的核心。随之而来的丝路重构和繁荣,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族裔群体间的互动交流,重构了世界,重构了中国社会和身份认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2]

一、移藩去篱、重铸辉煌: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与驿站交通

1. 从“双道并行”到“三路齐进”: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

边界快速推移之中,开疆拓土的蒙古大军如何

保证得到可靠的粮草给养和兵员补充?在不断扩张的疆域之上,远离故土的将士又该如何与千里之外的本土保持联系?迅猛增多的领土、不断推移的边界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如何能始终听命于大汗?这些问题,在地质单一、环境简单的蒙古高原和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同质度相对较高的中原,尚好找到答案。但是,一旦离开这些区域,西进到新疆以及更远地区之后,复杂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使其成为蒙元帝国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

众所周知,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所限,西域诸城郭或是散落于群山(阿尔泰山、天山)和高原(帕米尔高原)沟壑的草原之上,或是散落于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边缘的绿洲之中。其间或为高山、雪原、冰川,或为戈壁、沙漠,彼此孤立,相隔甚远,交通不便。诸国的语言文字、政治文化、风俗信仰、居民族属等也各有不同,长期处于“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的割据之态。哪怕是盛唐设府羁縻统辖之时,西域各地也多处于各说各话、各自为政的状态。为了水资源、草原牧场、绿洲可耕地和丝绸之路商业利益的争夺,彼此间不仅常有纠葛摩擦甚至战争的发生,而且多靠外力的介入,方能结束对立纷争之态,难以形成统一整体。因此,西汉之后,帝国羁縻之下尚能暂处统一的西域诸地,无不随帝国衰败分崩离析,丝绸之路因此也常受阻隔。

收稿日期:2015-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X10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4M551541);新疆财经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3BS026)

作者简介:闫国疆(1970—),男,新疆哈密人,副教授,博士后,从事历史人类学、身份认同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韬略过人的铁木真,极为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所到之处的道路修整,以方便军队辎重和人员来往。立国称汗之后,为了更好地统属所属领土,成吉思汗注意铺路修桥,积极维护传统的漠北交通线^①。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不仅把迅捷驿站传讯系统的构建作为战争必需的基础保障措施,而且将其作为开疆拓土、维护统治的一项重要行政事业来做。因此,他们在征服西夏和金并控制关中地区之后,立即重新恢复了中原经河西至西域并向西延伸的交通,使这条自先秦至唐代中期中、西方世界间的交通干线——丝绸之路重焕生机。

随着帝国疆域的拓展,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愈加清晰地认识到交通对于战争胜败、帝国统治的重要性。西域位居欧亚交通枢纽,西征统一西域之后,帝国统治者除了积极修缮和维护传统陆驿之外,还充分利用塔里木河、于阗河和叶尔羌河等地夏季水丰易于运输的自然条件,“立于阗、鸭儿看两城水驿十三”^{[3]118},这13个季节性的水陆驿站和之后所设的罗卜、闾里辉(今且末)、怯台(今奇台)等水驿,构成了一条通达西域的新的东西交通干线。这条经由河西——疏勒河——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脉北缘——葱岭而进入中亚地区的交通线路,较传统的交通线路更为迅捷,尤其是夏季丰水期,水陆并用的驿站系统可以大大缩短笨重货物的运输时间,同时还可以避免因传统线路受到战乱影响而被中断(马可·波罗西行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如此一来,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丝绸之路就由传统的“双道并行”变为“三路(北、中、南)齐进”,且是海陆兼通、畅达至极。具体来说,陆路北路由东向西,由西安出敦煌,经哈密,沿天山北路,过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土库曼斯坦,到克里木、抵达俄罗斯与东欧;中路,西出敦煌,经哈密,沿天山南路和塔里木盆地北缘过吐鲁番、焉耆、库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帕米尔高原到中亚、西亚及更远地区;南路则出敦煌,经罗布泊(楼兰),沿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脉北缘,过且末、尼雅、和田、喀什、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经由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到土耳其,达阿拉伯和非洲等地。

除了陆路水驿的建设,蒙元还十分重视海运港口和海上交通建设。在世界领先的造船术、航海术和绘图术的支持下^[4],蒙元时期逐渐形成了“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居高丽,物货丰溢”^[5]的庆元港(今宁波)、“舶通瓯吴及诸藩国,人物辐集”的潮州港和“万舶集奇货”^[6]的广州港,以及“如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只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

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7]的世界最大海港——刺桐城(今泉州),刺桐东可到日本、高丽,西可达今东非索马里、桑格巴尔海岸一带等地。由此一来,三路齐进、海陆兼通的丝绸之路,不仅为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而且使丝绸之路在重塑之中走向辉煌,开辟了其前各朝无法比拟的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

2. 移藩去篱、确保畅通:蒙元时期的驿站管理与交通维护

蒙元在努力改善对外交通的同时,还将大运河延长至大都,努力提升大都与全国各地的交通。此外,蒙元还积极建设西域诸地通达内地各处交通驿站,沿太和岭^②至别失八里一线,设置了30个新驿站,将欧亚大陆、中亚西域与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直接联系起来^[8],使昔日“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不敢过”的天山山道,变得“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9]229}。与前朝各代相比,蒙元时期的驿站交通所涉范围之广、道路之长、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皆为历史之最。据《元史》记载,元时全国共有驿站1383处。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则称有驿邸逾万所,“‘此种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当时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驿站‘星罗棋布,脉络相通’”,使“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10]559}

除积极建设之外,蒙元在其势力所及的辽阔欧亚大陆上,始终努力使各条道路上的驿站处于认真管理和经常修缮之态。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窝阔台、察合台、拔都等人,不仅在其所辖领土进行道路建设,而且“在这些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打井、提供水源”,所建驿站的“每一站提供粮食、马匹和牲畜”^{[11]80},既保证了蒙元军队的通行和指令、信函往来的顺畅,也为往来于四面八方的商贾、使团和行人提供了便利,为蒙元帝国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族属居民间的经济生存、文化交流和日常生活交往“撤除了藩篱和障碍”^{[10]559}。这不仅使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快速边界推移中,出现了“以往分裂时期的此疆彼界不复存在”的“天下一统”之局,促进了西域居民从绿洲到国家的身份认同^[12],而且使从欧洲到中国的漫漫长路,获得了日夜通行的安全保证,为东西方世界的人们“从地球一端去

①漠北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然后沿阴山(今天山)北麓抵阿力麻里。由此向塔刺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此路在13世纪上半叶是连接华北与西域的主要交通线路。

②太和岭地处今山西北部,位于雁门附近,有直通大都的站道。

看另一端”^[13]提供了方便,“沿着那一条条从帝国各处通往哈刺和林的大道,一切修士、大使、神秘僧人和吹牛皮的冒险者都朝这里涌来”^{[11]173},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并进。

3. 蒙元丝路重构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对于蒙元重构丝绸之路带与世界的影响,可以从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之遗产》中所列的一个清单略窥一二。李约瑟说:“到12世纪末时,(自中国)成串地传入了磁罗盘、艏柱舵、造纸术,还有风磨的设想,接踵而至的还有独轮车和加重抛石机”,“13世纪末14世纪初时,传来了另一串发明:火药、丝绸机械、机械钟和弧形拱桥……再往后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铸铁用高炉,还有雕版印刷,接踵而至的活字印刷”,“这个清单,尽管很不完整,但是澄清了对欧洲接受东亚发现和发明方面的历史上的疑惑”,“世界受惠于东亚,特别是受惠于中国的整个情况正在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14]226}受本文主题所限,李约瑟所言的“成串”好处,此处不做详述,下面仅以转述两段文字略加说明:日本著名东方学家中村元认为,“火药武器的使用,原为中国人所发明,而后来竟对改变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意义”。“火药于13世纪通过蒙古传到欧洲”,“枪炮的使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成为建设近代国家的重要因素”。“正是持有火器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才在南北大陆建立了近代国家”,并帮助它们“扩大了国家的版图”,“还强化了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并最终结束了以城池为根据的封建诸侯之间的争战。”^[15]李约瑟则指出,虽然“由于中国没有严实穿戴盔甲的由骑士组成的骑兵,也没有贵族或庄园式的封建城堡,新的武器仅仅是以前使用武器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对古老的文武官僚制度产生什么觉察得到的影响”,但是,它“在欧洲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莎士比亚时代起的数十年,实际上数百年间,欧洲历史学家已承认,14世纪臼炮的首次轰鸣敲起了城堡的丧钟,因而也敲响了西方军事贵族封建制度的丧钟”^{[14]225-227}。

当然,丝绸之路带给西方的绝非仅有火药和臼炮。如果没有丝绸之路的中介和蒙元帝国的影响,西方封建制度的丧钟不会敲响,近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建立和崛起也难发生,世界历史的书写完全也会是另一副模样。因此,BBC纪录片资深制作人罗伯特·马歇尔才会感叹:蒙元帝国“横扫世界的风暴改变了亚洲和欧洲的政治边界,把这片大陆上的人连根拔起”,“它改变了很多地区的人种特点,并且持续改变着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力量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蒙古人连通了东

西方,传播知识并且借此首次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世界。”^{[11]6}正是在这种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历史开拓中,西域不仅成为东西方世界互动往来的交通枢纽,而且从传统中国的“边疆”跃居帝国的核心,成为“世界文明、文化和种族的博物馆”。这种历史的跃居也是今日“新丝路经济带核心区”落户新疆的依据。

二、广纳贤才、多元统合:蒙元初期的国家治理

如果说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优质高效的驿站运输为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打造帝国提供了基础的设施保障,那么,宗王分封与行省直辖交叠共用的政治格局及其统合多元、为我所用的人才策略,则为社会的发展和治理提供了良好制度和人才保证,为帝国的强盛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主体条件。

1. 宗王分封与行省直辖:蒙元帝国一统天下的制度基础。

与唐、宋、金、辽的治理方式不同,蒙元帝国在其广袤的领土之上实行的是一种双重体制——中央直接管辖和宗王分封管理的模式。宗王分封是成吉思汗晚年依蒙古习俗,将帝国领土作为“兀鲁思”(汗国领地)分封给家族宗王诸子。各兀鲁思区域如下:长子术赤分得钦察、花刺子模和康里等咸海以西、里海以北地区;幼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直接控制的斡难河及怯绿连河流域一带;阿尔泰山、天山周围的草原地区主要分属于其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今日新疆阿尔泰山至阿姆河,包括天山南北路诸地的西辽及畏兀儿故地^[8],归察合台所属;额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东,从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以北,包括今喀拉额尔齐斯河及阿尔泰山一部分的游牧地区归属窝阔台。

需要说明的是,成吉思汗的宗王分封带有草原游牧传统的部族联盟式色彩,分封而成的各汗国均为蒙古大汗帝国的藩属地,各兀鲁思汗对所辖区域内的政事皆有裁决权,但其首领的承嗣仍由蒙古大汗(或皇帝)委派任命。成吉思汗分封宗王之后,各宗王及其子孙踏着成吉思汗西征的脚步,继续开疆拓土,并在四大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又名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又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构建起一个四汗一体、松而不散的庞大帝国体系(见图1(a))。

为了有效控制边界不断推移、领土不断扩大的帝国,成吉思汗在分封宗王的同时,在四大宗王统治区域之外,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绿洲地带(即原“城郭诸国”)和中亚农业定居区域实行直接军政管辖,官员由蒙古大汗直接派遣。这些区域主要包括:从高

昌畏兀儿地到阿姆河沿岸的和州(今吐鲁番)、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忽炭(今和田)、可失哈耳(今喀什噶尔)、阿力麻里(今霍城)、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塔塔尔迪·库尔干)、撒麻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和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城

镇^{[10]333-334}。这些区域与察合台、窝阔台兀鲁思皆有交错,同为蒙古大汗所属,各个兀鲁思之间实无明显的边界划分,基本处于虽有疆域划分,但却有边无界的状态(见图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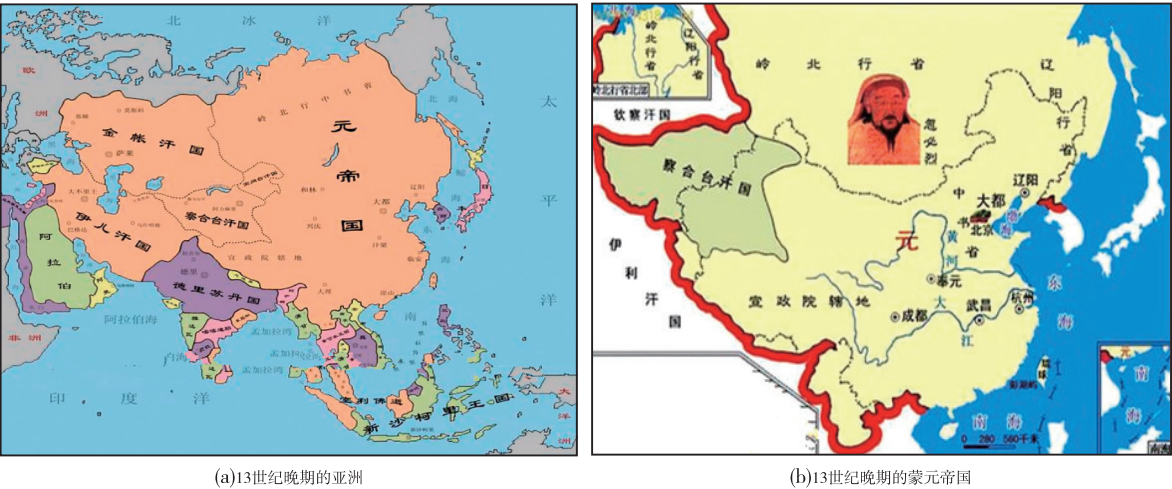


图1 13世纪晚期的蒙元帝国与亚太格局

忽必烈接过蒙古大汗权杖并一统天下之后,采纳儒生的建议,沿袭并完善了宋、金的行省制度,同时将其与成吉思汗开创的宗王分封制度相结合,形成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的大一统格局。这种格局中,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御史台为最高中央行政机构,在地方则设立路、府、州、县,同时设立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其中以行中书省的权力最大,一般下辖若干路、府、州、县,各路一般设总管府。在部分地区,行省下又设置作为行省派出机构的宣慰使司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统若干路、府、州、县。此外,还专设管理全国宗教事务并统领吐蕃地区中央机构——宣政院,辖地包括今日青海省大部及四川、甘肃、新疆和西藏的部分地区。如此一来,宗王分封与行省中央直辖相交叠,不仅有效防止了宗王分封可能导致的政权碎片化,而且有利于消除以往历朝“华夷之辨”所致的群体边界,极大加强了东北、西北、西南等传统边远地区与中原内地的联系,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

忽必烈时期的蒙元与成吉思汗、窝阔台和蒙哥统治下的帝国已经大不相同——更加庞大的帝国体系之内,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等控制西域以西亚欧辽阔领土的蒙古汗国,“虽然都要向忽必烈呈送象征性的贡赋,但再也不会会有一个团结在一位领导人的政策下的大帝国了”,“每一个广阔汗国都沿着自己的独立道路发展”^{[11]210}。然而,帝国开创者重视交通驿站系统建设、鼓励东西商业贸易

往来,以为帝国征服和发展提供经济物质保障的良好传统,却以各个汗国统治者刻意保持和维护的共同行为很好地延续下来,为东西方世界的交通和往来提供了便利。

2. 广纳贤才、为我所用:蒙元帝国治理的人才策略与主体保障

宗王分封与中央直辖的政治体制,为成吉思汗开疆拓土、整合碎杂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证。但其却不是蒙元帝国兴起的关键,真正为成吉思汗横扫亚欧、称霸世界提供关键保证的是成吉思汗广纳贤才、为我所用的人才策略,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力、物力、智力资源和基于其上的强大社会合力。

自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开始,蒙古统治者就十分注意汲取汉文化中的智慧,并将各地有“一才一艺者”罗致麾下,充分利用中原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与武器来为自己服务。进入中原之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采纳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礼贤下士,高度重视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儒、释、道、医、卜等文化技术人才,并多次遣人“采访医、儒、僧、道”^{[3]50},请他们向蒙古统治者传授汉文化,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智慧,为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服务。此外,帝国统治者还刻意提高商人、工匠、医生的地位,打破中国传统的“三教九流”之身份界划,将儒士之外的“其他的社会团体抬升到新的和更高的地位,对抗儒家传统”^{[11]215}。成吉思汗之后,其后人承此用人之道并予发扬光大,为蒙元帝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即位后就诏示天下:“天

道助顺,人计与能”^{[3]44-45},”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罔知攸济”“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为此,将在承继传统之中,“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3]45-46}在位期间,忽必烈不仅明令四处征战和戍守军士,“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牲犯桑枣禾稼者”^{[3]57},而且采纳许衡“国家之当行汉法”“则治功可期”之谏,行“居夷变夷”“用夏变夷”之道^[16]。南下收服郢州之后,即“选择蒙古、畏兀、汉人十四人赴行中书省,做新归附州郡的管民官。”^{[3]125}兵入临安之时,还专门派人将南宋国子监、史院、学士院及秘书省的各种典籍图书,集中起来经由海路转运回大都并悉数收藏,使大批前代珍贵历史文献免遭兵火。从实际效用来看,这些举动无疑为其招贤纳士、臣服民心、治理天下留下良好口碑,最终助其成就大业。后来灭元建明的朱元璋不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还将忽必烈与唐太宗、宋太祖一同祀入历代帝王庙,承认其中华“正统地位”^[17]。

长期征战中,随蒙古军队西征的各种工匠、艺人和来自中原内地的大批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西北,并随着征服区的扩大而逐渐向西延伸。与此同时,蒙古军队在西征后返回蒙古时所带回的征服地区的匠人和移民,又把被征服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中原内地。今人熟知的马可·波罗不仅任职于廷中而且深受忽必烈喜爱,除了参与朝廷外交并出使外国,还经常奉忽必烈之命巡视帝国各地,参与了帝国的建设与治理。与其同期的威廉·鲁不鲁乞(约1215—1270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往蒙古汗庭的使者)则在《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对服务于蒙元帝国的欧洲人做了许多描述,其中不仅有意大利人,还有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等。

这种打破身份界划,广泛吸纳不同文明所长并让不同地域、文化、族裔和阶层群体的人才参与国家治理的做法,不仅容易消除因为语言、文化和种族等先天差异因素所致的认同障碍,而且客观上提高了社会治理的功效率和不同社会成员彼此间的接纳度,促进了蒙元帝国所辖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3. 蒙元时期的社会发展

蒙元帝国的大一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了恢复和发展受损于战火的经济,蒙元帝国的创立者们在积极维护草原游牧生产方式的同时,努力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发展,为蒙元帝国取得其前各代草原帝国(匈奴、突厥、回鹘等)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功奠定了经济基础。

忽必烈继大汗位后,不仅专门成立管理和指导农业生产的劝农司,并且组织专门力量编撰颁布了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桑辑要》,发布了禁止废田为牧、减免农民租税、鼓励垦荒屯田、围海/围湖造田、兴修水利等系列诏令,积极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除了政策扶持之外,耕锄、耘荡、水转连磨、牛转翻车、高转筒车、搅车、卷筵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水力机械的使用和推广,不仅使粮食和棉花、西瓜、蚕豆、萱麻等新入作物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还使棉麻纺织、丝绸织染、毡罽制盐、兵器制造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极大提升,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为保证辽阔疆域内的商业贸易便利,蒙元时期还发行了广泛流通的统一纸币——元钞,使其成为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走向辉煌的一大促进因素。除了世界领先的造船术和航海术之外,蒙元时期科技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体现在天文学上。此时,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博采众长,不仅制造了精准的简仪、仰仪、定时仪、日月食仪、圭表、景符等仪器,还建立了设备完善、仪器先进的大型天文台^①和规模空前、遍布各地的天文观测系统^②。基于此而制的先进历法(《授时历》)则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③,与此相关的数学、地理学、农学、军事学皆有重大发展。比如,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天元术”(立方方程)、“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统测全国山川里至、城郭乡镇、土产风俗、建制沿革、古迹人物的《元一统志》,描绘帝国疆域的《舆地图》,探求江河水文和海岛分布的《河源志》与《岛夷志略》等。蒙元时期另一重要科技贡献是火药与弹道技术的高度结合的白炮和“火铳”的定型,它们的发明和使用,对于世界的改变有着巨大影响。

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政策扶持,使中原的农艺垦作、活字印刷、火药火炮制造等先进的技术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而由东往西逐渐传播;原产于西域的棉花及其种植和纺织技术则在蒙元以后经由海陆两路而更大规模地传入内地,并且,除了许多珍贵农作物品种与优良技术之外,来自西域、阿拉伯世界的诸

①其中以大都天文台(今北京)、上都天文台(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登封天文台(今河南登封市内)为最。

②忽必烈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元所属领土建立了27所天文观测台站,其中最北的已达北极圈附近,最南的亦达占城南海测量所则在今越南南方。

③蒙元时期,中国做了当时世界最精确的恒星观测和黄赤交角测算,其中后者的精确度与现代天文学的理论误差仅有1'6.8"。郭守敬等人测算出二十八宿中杂座诸星中前人未命名的有1000多颗,总数达2500多颗,远远超出了欧洲截至文艺复兴之前的1022颗。

多饮食烹饪技术、毛毡和烧酒制作、天文历法等也由西往东传入内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内地居民的生活。战事结束以后,来往于蒙元帝国广阔领土上的东西方商人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交流和发展,极大促进了蒙元帝国实力的增长。据统计,1276年,元人口仅为4 800万,到了顺帝(1333—1368年在位)初年,人口已达8 000万,屯田面积达1 185 333 hm²。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交通和大幅增长的良田,伴随着迅速增长的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蒙元帝国真正雄霸于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中国进入隋唐以降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期^[18],以全新的等级性群体身份界划(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华夷”身份界划,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文化心理和身份认同,以全新的身份融合与社会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三、结 语

时过境迁,丝绸之路在蒙元帝国衰亡之后再次衰微下去。明清之时,虽然也有小的复兴,但已难与蒙元相比,并在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的衰亡沦为历史的记忆。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族建立的强大王朝,虽然蒙元帝国在建立初期的攻城略地中充满了血腥与残暴——可谓“建立在血泊中的,是由废墟堆积起来的”,并且帝国建立与征战中的屠杀与残暴,“总是最让历史学家感到踌躇”^{[11]60}。但是,与“帖木儿或者其他的暴君都大不相同”的成吉思汗却能在辽阔的领土上,实行“非常了不起的宗教宽容政策”,并且“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被征服者其实很快就会得到自由,从来就没有政治或种族方面的暴政压迫”^{[11]61}。特别是,晚年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窝阔台、忽必烈等人)能够采纳丘处机、耶律楚材等人建议,近道从善,放弃残暴,以辽阔的疆域、畅达的交通和良好的治理重塑、繁荣了丝绸之路,而且,最终“获得了忍受其统治的民族几乎是全面的赞同”,“将这些民族联合起来了,懂得了致力于执着他们的忠实,以至于‘蒙古式的和平’留下一种几乎可与‘罗马式的和平’相媲美的记忆。”^{[19]357}这种记忆在颠覆传统、重塑文化、重构身份中构建起全新的社会认同,增强了多元民族统一体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随蒙元帝国兴起和发展而复兴并繁荣的丝绸之路,就是“一种惹人注目的文明”书写的辉煌文明之路。正如法国学者鲁保罗所言,它是“建立在宗教宽容、对所有人的同等公正、绝对的廉正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上的”,“享受着史无前例的贸易发展高潮”^{[19]357},为世界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21世纪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丝绸之路及其精神的巨大价值。随着丝路申遗成功和“一带一路”远景规划的推出^①,“丝绸之路”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2015年8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代表1 5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发出呼吁:我们不仅要关注作为遗产的“丝绸之路”,更要让“世界各国共享的”这个“历史和文化遗产”为今日世界服务,让其在复兴之中为全球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0]。第一届“国际历史学会——积家历史学奖”得主塞尔日·格鲁津斯基则直言,“面对多种形式的过去”,我们必须放弃单执一极、难容他者的历史观念,要尽可能地在“他者”边界的推移中,“越来越少地厚此薄彼”,让历史的记忆和智慧为今日造福。

事实上,弘扬“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愿景规划,不仅会为世人提供“走出地球的一端去看另一端”的方便,满足更多与“1530年代西班牙人初涉美洲大地时”一样,怀抱“穿过太平洋达到这片‘秦人’的土地”^[13]之梦想的人,而且使新疆再次获得从中国的“边疆”跃居“核心区”的可能。但与蒙元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规划既非谋取霸权的政治策划,也非难容差异的经济同化,更不是征服世界的帝国计划,绝不会产生武力征服的残暴和血腥。“一带一路”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强调的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下谈合作,主张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基础上搞建设。此外,借力“丝路”图谋发展,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和行动^②,围绕“丝路”进行超越宗教、民族、国家、文化边界的广泛交往,已成为新的国际交流期盼和实践方式^[21],“一带一路”规划不过是对这种期盼和意向的一种回应而已。

蒙元时期丝绸之路重构和繁荣的历史表明,“一带一路”的建设,必然有利于地球村的居民从“地球的一端去看另一端”,促进不同区域、不同文

①2014年6月22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为世界文化遗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丝绸之路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受到全球保护的世界遗产。

②21世纪以来,多个国家和联合国均对复兴“丝绸之路”表示浓厚兴趣,继日、美、俄、中之后,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蒙古、印度皆有相关计划出台。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联合发起的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得到了19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19国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430亿美元。

明和不同族裔群体的交流与融合,形成新的多元包容的身份意识与社会认同。这不仅是对“世界各国共享的一个历史和文化遗产”^[20]的精神继承,而且会使其在拓展升级中更加稳定,既难被一般的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或安全冲突打断,也有助于化解已有的矛盾和冲突,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提供保障。总体来看,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的建设都会在复兴并超越古丝绸之路的同时,对亚欧大陆乃至全球进行深度的立体重塑。而在如此重塑之中,新疆必然会再次跃居多个层次、多个方向、多元交融的区域中心,而非纯粹图画地理的“亚心”和单一经济的“核心区”。这一构建如若完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世界即有可能,“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得到统一”^[22],自会带与全球居民巨大福祉,曾经造福世界的“丝绸之路”必将造福今日并“继续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9]312}。

参考文献:

- [1] 毛汉英,阎顺,孙壮志,等. 亚欧大陆中心到底在新疆、中亚还是东欧? [J]. 中国国家地理“一带一路”白皮书,2015(10):106-113.
- [2] 习近平.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N]. 光明日报,2015-08-24(1).
- [3]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1册[M]. 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历史:第33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278.
- [5] 李翰. 元代社会经济史稿[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329.
- [6] 周良霄,顾菊英. 元代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23-525.
- [7] 勒内·格鲁塞. 草原帝国[M]. 蓝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96.
- [8] 朱太山,余太山. 西域通史[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351-352.
- [9] 刘迎胜. 丝绸之路[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10] 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11] 罗伯特·马歇尔. 东方风暴: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挑动欧亚大陆[M]. 李鸣飞,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 [12] RUDELSON J J.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5.
- [13] GRUZINSKI S. When the eagle visits the dragon,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R]. Jin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 Shandong University,2015.
- [14] 潘吉星. 李约瑟文集[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 [15] 何兆武,柳卸林. 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90-591.
- [16]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5册[M]. 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2935.
- [17] 张星久. 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秦汉之后的“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8(5):5-14.
- [18] 闫国疆,郝新鸿. 多元共生、动态交融:回鹘西迁后的西域文明与居民身份变化[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49-56.
- [19] 鲁保罗. 西域的历史与文明[M]. 耿昇,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20] HIETALA M.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R]. Jin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 Shandong University,2015.
- [21] 彭兆荣. 线路遗产简谱与“一带一路”战略[J]. 人文杂志,2015(8):50-56.
- [22] 闫国疆. 人类存在的矛盾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1):18-22.

